



遗产与未来——罗德尼·哈里森教授访谈

●王永健 罗德尼·哈里森 / 文,王永健 / 译,王林洁 / 校

摘要: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作为国际学界知名的遗产研究专家,其核心理论建构及其在全球遗产研究领域中的思想贡献对当代遗产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他围绕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形成背景与理论特征,重点探讨“遗产未来”“人类世”“气候变化”与“整体性遗产治理”等关键议题,揭示遗产研究如何从以保存过去为中心,转向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他还结合气候变化、环境正义、能源转型、数字技术与公众参与等当代全球性议题,阐明遗产在应对人类世危机中的方法论价值与行动潜能。他通过引入中国语境与全球南方视角,指出去欧洲中心主义、强化跨文化比较与南北知识对话,是当代遗产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这样的研究不仅呈现了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前沿理论图景,也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定位与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文化遗产;人类世;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整体性遗产治理

文章编号:1003-2568(2026)04-0005-11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译者:王永健,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秘书长。

作者: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博士,伦敦大学学院资深教授,《当代考古学杂志》创始主编。

校译者:王林洁,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引言

王永健(以下简称“王”):尊敬的罗德尼·哈里森教授,您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承办的2025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年会上,您的发言很精彩。后来,我将您的系列研究论文发到了学会的会员群中,引发了高度关注。此次,应《民族艺术》编辑部的邀请,很高兴能够有这次机会对您进行专访。我关注到您是美国人,现定居英国,在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工作,专注于遗产领域的研究工作,而且您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此次访谈,我想和您一起系统地梳理您的求学经历、研究历程、代表性理论成果的研究缘起,思考与形成过程,以及欧洲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与前沿理论等。那么,我们先从您的求学经历谈起吧。

一、求学经历与研究缘起

王:请简要叙述您的求学历程,以及最初是如何进入遗产研究领域的,这一学术选择背后有哪些思想动因。

罗德尼·哈里森(以下简称“哈里森”):感谢《民族艺术》编辑部的邀约,也感谢您对我的访谈。谈起我的学术背景,我在澳大利亚接受了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系统训练,最初从事史前研究,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澳大利亚的殖民背景下,我不仅对遥远的过去,也对近代原住民的历史,以及欧洲殖民对原住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感兴趣。在西澳大利亚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研究项目开始探讨当今人们理解过去的方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不同的理解对人们的未来有何影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开始在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

生动物管理局工作,最初担任历史考古学家,后来担任区域原住民遗产项目协调员。

我的第一本著作《共享的景观——新南威尔士牧业与属地认同考古》^①,探讨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定居者如何共同发展了澳大利亚的牛羊养殖业,以及这种发展如何体现在国家公园体系的遗产中。我还开始研究原住民的土地诉求,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提供的各种实证证据是如何支持这些诉求的。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是一个有趣的机构,因为它既负责管理自然遗产(例如生物多样性和国家公园),也负责管理文化遗产(包括国家公园内的历史遗产和遍布全州的原住民遗产)。在那里的工作经历确立了我若干核心研究兴趣,并逐步发展为我后来系统展开的“全球比较遗产研究”这一研究方向。该研究领域始于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并在人类学家霍华德·墨菲(Howard Morphy)教授的指导下逐步形成。这些问题涉及相互冲突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决定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管理方式的不同,例如不同形式的遗产实践如何实现彼此迥异的未来等。这些问题在与本次访谈一同发表的译文《超越自然与文化遗产:迈向人类世的遗产本体论政治》^②中有明确的探讨。

2007年,我移居英国,成为英国开放大学首位遗产研究讲师,并在此创建了全球遗产研究的全新教学和研究项目。虽然我一直从事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研究——例如,我创办了《当代考古学杂志》,该杂志于2014年出版,旨在为探讨这两个学科的交叉领域提供一个平台——但自那时起,我的研究工作日益聚焦于批判性遗产研究和博物馆学。2012年,我加入伦敦大学学院,并于2016

年晋升为遗产研究教授。

王:在您的学术发展过程中,哪些学者或理论对您影响最大?

哈里森:我的研究融合了多种不同学科的理论框架。首先,我深受我在澳大利亚及其他地方合作过的原住民和全球主流思想家及哲学家的影响。我们通常看到的学术界“新”的后人类主义转向,对我来说,最初是在与“万物有灵论”的哲学对话,以及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理解各种地球生物(如植物、动物和景观特征)复杂交织的作用方式的思考中形成的。万物有灵论和后人类主义挑战了人类是宇宙中心或天生优于其他生命形式的观点,呼吁去人类中心化,转而承认非人类实体和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交织的能动性。它超越了传统的人文主义二元论,例如身体与心灵、人与机器,或人与动物的分离等。相反,它关注连接所有实体的共同物质和相互联系。在我的研究工作中,这意味着挑战人们通常对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所做的区分。后人类主义强调身份和存在是关系性的,是通过与其他人、非人类以及环境的互动形成的,而不是基于孤立的、自我封闭的个体。这在我们当前全球环境危机的背景下尤为重要,而环境危机也是我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领域,它凸显了人类行为与地球命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后人类主义与万物有灵论促使人们重新定位人类在地球系统中的位置,将人类视为一种能够深刻影响地球过程的力量,并由此探索人与自然共存的新方式。例如,我在《遗产的未来》一书中运用“世界化”概念的方式就体现了这一点,该书借鉴了万物有灵论思想,以及人类学家安娜·青(Anna Tsing)、玛丽索尔·德拉卡德纳(Marisol de la Cadena)、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和

①Harrison, Rodney, *Shared landscapes: archaeologies of attachment and the pastoral industry in NSW*, UNSW Press, 2004.

②Harrison, Rodney, *Beyon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oward an Ontological Politics of Heritage in the Age of Anthropocene*, *Heritage & Society*, 8(1), 2015, pp.24-42.

爱德华多·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ieros de Castro),物理学家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以及哲学家罗西·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和伊莎贝尔·斯滕格斯(Isabelle Stengers)等不同学者的本体论视角。

我曾在有殖民历史背景的澳大利亚定居,深受米歇尔·福柯权力与知识理论的启发,同时也受该理论流派重要阐释者的深刻影响,既包括托尼·本尼特、阿希尔·姆贝姆等人的相关研究,也涵盖伊丽莎白·波维内利等对晚期自由主义状况展开专门探讨的学者思想。本尼特关于文化概念与社会治理实践之间关系的研究对我影响尤为深远。我与他及其他学者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并最终出版了《作为治理技术的收藏与分类:人类学、博物馆与自由主义政府》^①。该研究探讨了20世纪早期至中期不同形式的人类学收藏实践及其与社会治理实践的关系。

我也深受以下观点的影响:强调以更对称的方式理解不同形式的能动性在异质网络中的分布,这些网络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这种观点借鉴了布鲁诺·拉图尔的科学研究和更广泛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吉尔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对“集合体”(assemblage)概念的阐述[曼努埃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这有助于我们关注构成“遗产集合体”(例如博物馆和遗产地)的各种异质元素——包括物品、人物、场所、实践、宣言和官僚机构——以及它们多种多样且分散的运作方式。这些是我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②一书中阐述的关键概念。该书于2018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最后,我深受英国文化研究,或者说是伯明翰

文化研究学派思想脉络的影响,尤其是牙买加裔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思想的影响,以及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与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等学者理论著述的启发。霍尔曾任伯明翰大学社会学教授,并于1997年起在英国开放大学任教,其间他在表征、种族、媒体、身份认同和情境分析等领域开展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至今对遗产和博物馆研究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尽管他于1997年从开放大学退休,但直到2014年去世前,他一直担任该校的荣誉退休教授。2007年,我刚开始与开放大学合作时,霍尔的著作和学术遗产对我早期批判性全球遗产和博物馆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此外,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和莎伦·麦克唐纳(Sharon Macdonald)的著作也对我影响颇深。我通过英国开放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联合成立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研究中心结识了他们二人。保罗·吉尔罗伊曾与霍尔一同在伯明翰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极大地拓展了霍尔关于种族与文化的研究。2020年,吉尔罗伊加入伦敦大学学院,担任莎拉·帕克·雷蒙德种族主义与种族化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我们由此成为同事。我们曾合作开展了两个项目的研究,旨在探索遗产、气候和种族正义之间的交集。我从吉尔罗伊的作品中汲取了许多重要的概念,但他最近关于行星人文主义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如何重新思考和改造20世纪黑人大西洋学者的人文主义传统,使其能够以多种语言发表作品,从而一方面应对全球危机,另一方面又强调种族等级制度作为自然和历史表达方式的特殊重要性,这对我从事遗产、博物馆和气候行动方面的工作尤为重要。

^①Bennett, Tony, Fiona Cameron, Nélia Dias, Ben Dibley, Rodney Harrison, Ira Jacknis, And Conal McCarthy, *Collecting, Ordering, Governing: Anthropology, Museums, and Liberal Governmen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②Harrison, Rodney,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Routledge, 2013.

这表明,对以种族名义造成的破坏进行历史思考,可以教会我们关于人类过去和未来的知识,并有助于我们对世界作为共同星球家园的理解。

二、理论反思与形成过程

王:您如何理解“遗产”这一概念在21世纪的变迁及其跨学科意义?

哈里森: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一书中,我论证了“遗产”这一概念的出现源于一个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虽然,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有着更深远历史根源,但我认为,对遗产的新理解和新方法出现在20世纪中期,这源于二战后在北美、英国和西欧兴起的“记忆崇拜”,并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革而加速发展。这些变革包括:去工业化进程、新型通信技术和电子媒体的兴起、技术的全球化及其与生产和消费模式改变的关联、大规模移民的普遍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跨国主义(就资本、技术、劳动力和公司而言)的兴起、涉及更灵活的资本积累和分配形式的新型资本主义模式、与加速变化和“速度”感知相关的时空体验的变化等。简而言之,遗产既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应对风险和变化的倾向或态度,也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物品、场所或实践。二战后发生的各种全球性发展,对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制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公约对遗产概念的全球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认为,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后的“遗产热潮”,在这一热潮中,19世纪末博物馆的收藏和策展理念被应用于全球经济变革与去工业化的背景下,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场所、城市和景观的博物馆化提供了模式,并加速了这一进程,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在当代世界所经历的遗产的普遍“饱和”。

王:作为推动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关键人物之一,您如何理解其主要理论和方法特征?您认为它与传统遗产研究相比最重要的突破是什么?

哈里森: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颁布以来,过去50年间,世界各地官方认定的遗产对象、场所和实践迅速扩张,催生了新的产业、职业以及广泛的学术探讨。正因如此,遗产常常被认为因其与其他领域(尤其是遗产保护、旅游和休闲产业)的关联而受到损害。历史学家通常认为,遗产产业(heritage industries)充其量是历史的传播和普及者,最坏的情况则是兜售“错误”历史的人。建筑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为了迎合大众教育和政治需要,为了权宜之计而简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意义问题表示担忧。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指出,对过去某些物质方面的崇敬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固有特征。地理学家从城市研究和规划的角度探讨遗产,以及遗产与城市更新和中产阶级化等过程的关系。生态学家、生物学家和自然地理学家则关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可持续性概念。因此,批判性遗产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并非自然而然地从任何一个单一学科中衍生而来,它是一个广泛而异质性的学术领域,涵盖了我们的选择保护什么,为什么保护的研究,以及对“过去”的政治性解读,对遗产管理的具体过程及其如何在不平等的专业知识和权力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研究,对纪念行为与公共和私人记忆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与政策制定以及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紧迫的政治、生态、经济和社会议题紧密相连。

然而,这一切都引出了同一个问题:“我们为何要对界定跨学科批判性遗产研究这一‘领域’感兴趣?”过去,遗产研究往往从特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界限分明的学科立场出发,这阻碍了人们将遗产视为一种包罗万象的当代全球现象进行探索。考古学家关注考古遗址和文物的保护,历史学家致力于推广准确的公共历史,人类学家关注遗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地理学家关注自然和文化景观,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关注动植物物种的保护。此外,遗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市政、州和

国家法律法规的遵守,并卷入了地方、区域和国家认同及文化经济的建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往往不会跨越国界去探索共同关注的领域。土著居民和其他全球多数族群以及非西方民族,在运用替代模式来定义和管理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提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间不存在区别的观点方面),为这一多元化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重要且具有独特专业性的视角。然而,学者们很少从比较的视角来考察遗产保护实践的形式。我认为,我们当代对遗产的全球性回应——无论是保护历史景观、动物物种、濒危语言,还是少量史前石器——最终都源于一系列共同的考量,这些考量与全球化经验、后现代性条件及其伴随的“濒危意识”密切相关。我借用费尔南多·维达尔(Fernando Vidal)和内莉亚·迪亚斯(Nelia Dias)在其著作《濒危、生物多样性与文化》^①中提出了这一概念。设立批判性遗产研究领域,并非必然意味着要对遗产的“好”或“坏”做出道德评判,而应关注观察、理解和阐释遗产的运作方式及其社会、物质、政治和生态影响。同样,在将遗产广义地视为一系列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实践领域时,也应关注不同形式的遗产和保护实践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王:在当今全球学术格局下,这一理论体系如何回应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呼吁?

哈里森:自然与文化、有形与无形遗产在本体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遗产对象、场所和实践管理上的碎片化,对于包括许多世界原住民在内的全球多数族群而言并不陌生,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对这种做法质疑。例如,当人们将土地视为自身身份的一部分,将植物、动物和/或自然力量视为家人时,文化遗产与环境健康之间的交集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样,我们知道

气候变化对世界上最弱势群体的影响最为严重,这凸显了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之间重要的联系。因此,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工作组关于“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的第六份,也是最新的一份评估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系统性的历史和当代不平等形式,无疑加剧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并直接导致了世界各地人类和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不均衡。因此,当下的全球遗产体系本身应被视为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特征,并急需推进去殖民化进程。批判性遗产研究为质疑既有遗产实践及其背后的认识论与本体论前提提供了重要路径,并能够为这一转型过程做出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贡献。

王:我觉得您的理论很有启发性。您认为,就目前的遗产保护体系而言,在政策和实践方面有哪些值得反思或改进的地方?

哈里森:有许多人认为构成我们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物品、场所、习俗以及人类和非人类社群彼此独立,无需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可进行管理和维护,这种观点是奇怪的。事实上,这种观点现在普遍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殖民世界观的产物,它强化了人类例外论的观念,以此来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剥削和掠夺的关系,以及不同种族或文化群体之间等级森严、不平等和剥削的关系辩护。基于这种观点,在整个20世纪,一系列日益孤立的专业领域发展起来,用于管理各种自然和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很大程度上是从其被人类使用和开发的价值角度来理解的——而这样做,在很多情况下,非但没有对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有帮助,反而加剧了环境和文化的退化进程。

今天,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承受着这些发展带来的遗产,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国际和国家政策、法律与专业实践体系的碎片化,在这个体系

^① Harrison, Rodney, *World Heritage Listing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Endangerment Sensibility*. Vidal, F., & Dias, N. (Eds.). *Endangerment, biodiversity and culture*, Routledge, 2016, pp.195-217.

中,保护一种特定形式遗产的尝试实际上可能会阻碍,或充其量会给保护另一种遗产的尝试带来麻烦。

事实上,我们历时4年、由多位研究者参与的比较性国际实证研究——《遗产的未来》^①一书,对25个不同的保护实践领域进行了考察,其主要发现之一是:不同形式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通常在开展时并未考虑彼此之间的关系或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是负面的或相互冲突的,从而削弱了相关实践的有效性。因此,一项自然、文化、有形或无形遗产保护实践,所致力于实现的世界和未来很少是一致的,而且常常与其他实践存在显著差异。鉴于影响环境的重大全球和区域挑战,以及影响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驱动因素(包括气候变化、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集约化、城市化和人口变化),迫切需要新的、更有效的协调方法来保护和管理自然、文化、有形以及无形遗产。

但遗产的意义远不止于保护和管理。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对气候和环境的改变已达到如此显著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无法再假设地球的地质、生态和气候会一直保持稳定状态,即便是在个体的一生中也是如此。这意味着遗产管理者自身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环境和物理变化,包括某些文化和自然资源的丧失与转变,尤其在沿海地区,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传统上,遗产管理通过积极的保护措施来应对这些变化,但关注景观以及对有形和无形、文化和自然价值的综合理解,则为重新调整遗产管理工作方向,使其能够与不可避免的变化进行有效合作,而不是与之对抗,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人权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已被欧洲委员会特别强调为一项战略优先事项。我近期与欧洲委员会合作制定了一系列自然、文化和景观综合管理指南,这些指南借鉴并扩展了我们《遗产的未来》的研究成果,并与东亚其他地区的进展密切相关,例如韩国新的国家遗产体系,该体系将自然、文化、有形和无形遗产的管理整合到一套统一的法律和政府部门之下。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物种灭绝、污染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退化,对全球人权的享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合作。只有采取基于对自然多样性、文化环境和气候相互关联并置于特定背景下理解的综合/整体与跨部门方法,我们才能应对同样威胁了文化和自然环境以及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危机。

基于欧洲委员会的人权和参与式方针,以及其在文化、自然和景观领域的各项公约,近期发布的《L. I. N. K. E. D.——文化、自然和景观综合管理指导原则》^②(欧洲委员会,2024)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行动/工具,可酌情在国家、区域或地方层面使用,以加强人、文化和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更好地保护和扩展文化、自然和景观多样性。这些行动/工具借鉴了政策制定、管理、研究以及实践中的整体/综合方法,并强调环境正义以及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鉴于文化和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相同的措施和工具(保护区、公约、立法、指南、政策)进行管理的,该指南旨在强调将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和/或整合的新方法,以更好地保护和扩展文化、自然和景观多样性,这对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福祉至关重要。

①Harrison, Rodney, DeSilvey, C., Holtorf, C., Macdonald, S., Bartolini, N., Breithoff, E., Fredheim, H., Lyons, A., May, S., Morgan, J., & Penrose, 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UCL Press, 2020.

②Council of Europe—Steering Committee for Culture, Heritage and Landscape (CDCPP). *L.I.N.K.E.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ulture, nature and landscape management*. Council of Europe, 2024. 可在线免费获取,网址为:<https://www.coe.int/en/web/culture-and-heritage/linked-principles-culture-nature-landscape-management>.

三、遗产与未来的前沿思考

王:最近的大部分研究项目都集中在遗产保护和“绿色转型”方面。您是如何理解遗产保护与气候行动之间的关系?

哈里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巴黎协定》都认识到公众参与气候行动至关重要。它们都强调公众教育、关键人员培训、公众意识宣传活动、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决策、公众获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和政策信息以及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这六个领域被非正式地称为“气候赋权行动”(Action for Climate Empowerment,简称ACE)。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在ACE中的关键作用在2018年的COP24上得到了认可,当时它们被纳入了《巴黎协定》的行动计划——卡托维兹方案。它们的关键作用在《格拉斯哥气候赋权行动工作方案(2021—2031)》中得到了重申。我通过参与围绕《格拉斯哥工作方案》草案的讨论以及在COP26上参与“重塑博物馆以应对气候行动”项目和展览,直接为这些进展做出了贡献。这项工作为后续制定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工作方案(2023—2025年)和阿联酋全球气候韧性框架(2024年)奠定了基础,这些方案明确将文化遗产列为六个重点领域之一,并明确承认文化和遗产在增强公民对气候行动战略的信心以及社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韧性和适应能力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重塑博物馆以应对气候行动”^①最初是一项设计与创意竞赛,于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启动。该竞赛围绕气候行动的两大支柱——减缓和适应——展开,探讨博物馆如何帮助社会做出深刻的变革,以实现净零排放或零碳排放的世界。竞赛并未聚焦于特定地点或类型的博物馆,而是旨

在征集能够动摇和颠覆博物馆学思维基础的提案,以支持和鼓励有意义的气候行动。我们特别要求提交与“传统”博物馆截然不同的设计和概念方案,或探索传统博物馆运作的新方式。参赛作品涵盖博物馆设计和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到高度务实的方案,应有尽有。本次竞赛于2020年9月15日截止,共收到来自50个不同国家的500多份意向书和250多份正式参赛作品。在格拉斯哥科学中心和国际评审团的合作下,我们邀请了8支队伍为在格拉斯哥科学中心举办的展览制定方案。格拉斯哥科学中心是2021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届缔约方大会(UNFCCC COP26)的官方“绿色区域”。

此次展览与科学中心的“赋能未来”展区相结合,旨在强调文化机构在塑造未来世界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展览展出了来自巴西、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和英国的方案。展品形式多样,涵盖互动模型、概念设计、应用程序和短片等。这些方案的全球视野表明,博物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也体现了博物馆界内外人士重塑博物馆模式以应对当代复杂问题的雄心壮志。

展览期间,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包括COP26期间的配套活动,例如放映我们为本项目委托制作的多部影片。此外,我们还与众多合作伙伴共同举办了一系列国内和国际研讨会,旨在推广和鼓励从业人员使用该工具包。

王:在全球气候危机和环境伦理的背景下,我们如何重新思考遗产管理的社会作用和政策价值?

哈里森:气候危机要求能源基础设施及其相关的制度、政治和经济体系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与此同时,“绿色转型”所伴随的社会和文化

^①Harrison, Rodney and C. Sterling (eds), *Reimagining Museums for Climate Action*, London: UCL, 2021. Available online in open access at <https://www.museumsforclimateaction.org/mobilise/book>.

变革虽然不易被察觉,却同样具有深远意义。然而,实现气候中和所需的步骤并非政治中立。事实上,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一个获得民主支持的绿色转型需要的远不止技术官僚式的解决方案和创新政策。能源转型的文化层面是深远的,它触及历史、记忆、社区、美学以及许多其他方面。

2023年12月,我们启动了一项由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资助的全新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为期4年,总经费达350万欧元。项目旨在探索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如何赋能公众,共同应对迈向气候和社会道路上的诸多挑战。该项目名为PITCH(全称为“绿色转型背景下石油文明^①与文化遗产部门的关联性研究”, Petroculture's Intersections with The Cultural Heritage sector in the context of green transitions),汇集了来自6个欧洲国家的学术和文化合作伙伴,共同研究博物馆、遗产地、文化机构和艺术空间如何支持社区与组织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实现能源转型。在此背景下,“支持”一词包含多重含义。首先,我们希望揭示化石燃料对文化遗产实践(包括从策展实践到遗产旅游等多个层面)的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致力于开发新的诠释模型,将化石燃料文化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构建新的遗产叙事和体验,凸显能源系统与文化变迁之间的相互交织。最后,项目团队将为遗产保护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发工具和指南,重点关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层面。通过这些努力,PITCH项目旨在为博物馆和遗产保护领域引入新的实践与概念,以叙述和阐释化石燃料时代的遗留问题,进而为构想和塑造一个“后化石燃料社会”提供新的途径。

王:在您的著作《去地域化未来:人类世的遗

产及其后时代》^②中,您是如何看待“人类世遗产”这一概念的?这一理论旨在解决哪些学术挑战?

哈里森:我认为,遗产的根本在于我们如何借鉴过去,并在当下利用自然和文化资源来建构新的未来。“人类世”的概念——即人类已成为地球变化的主要和根本驱动力的时代——迫使我们把人类行为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如气候变化、物种灭绝、废物、化学污染)都视为遗产的组成部分,视为我们人类遗产的一部分,并为了我们自身以及非人类伙伴物种的未来,重新思考我们与地球的关系。

王:您的遗产未来项目被广泛认为是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一。该项目的最初目标和主要成果是什么?

哈里森:“遗产未来”(Heritage Future)是一个大型的国际跨学科研究项目,旨在比较和探讨一系列不同遗产实践的未来创造能力,包括濒危语言保护,物种和景观复野,濒危动植物DNA的低温保存,植物园、博物馆以及历史建筑和景观保护者的工作等。该项目针对遗产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关键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保护自然或文化遗产是为了子孙后代,或者说是为子孙后代提供资源。认真思考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这种说法所设想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谁又是这些遗产的继承者?通过分析和比较10多个国家25个以上不同的区域、国家和国际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我们得出结论:只有以综合的方式管理不同形式的遗产,才能真正发挥不同遗产实践的未来创造能力。许多当代保护实践缺乏可持续性,未来的遗产保护工作者不仅需要关注保护本身,同样也需要找到缓解措施,并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适应、再利用、变化、转

①使用“石油文明”一词来描述石油如何塑造社会想象、经济话语和对现代性的理解。

② Harrison, R. and C. Sterling (eds), *Deterritorialising the Future: Heritage in, of, and after the Anthropocene*,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20. Available online in open access at <https://www.openhumanitiespress.org/books/titles/deterritorializing-the-future/>.

型乃至丧失的过程。显然,气候变化使这些问题尤为突出。

“遗产未来”项目由一个国际化的跨学科项目团队组成,该团队由16位研究人员组成,每位研究人员都围绕我们四大主题中的一个或多个主题开展工作,并与我们的25个学术和非学术合作伙伴机构合作。在实证研究方面,该项目借鉴了与这些机构开展的比较研究成果,这些机构代表了在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我们的研究合作伙伴包括博物馆和博物馆专业组织、运行濒危语言记录计划的相关机构、文化遗产和保护区管理机构、冷冻动物园、植物标本馆、种子库、植物园和开展景观再野化^①项目的实施单位,以及一系列以不同方式代表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益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我们也涉足了一些通常不被视为“遗产”的领域,例如核废料处理和外星通信计划。我们认为,这些领域与遗产实践有着某些共同的目标,可以与遗产实践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我们与十几个不同国家的相关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收集了本项目最终专著所依据的实证材料。

该项目的核心理念是:未来并非凭空涌现,而是人为设计的。我的意思是,未来是由当下的行动构建和组装而成的,而这些行动又是源自特定时刻中的事物、人物、地点和实践所形成的特定组合,并在冲突或协作中汇聚在一起。我们广义地使用“保护”一词,指的是在当下为了未来而对过去的植物、动物、语言、实践、观念、个体、事物、痕迹、遗留物与物质所进行的维持与保存(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遗产的表述,即遗产是“来自过去、为未来世代而保存的事物”)。但更为

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不同的保护实践形式往往会构建出截然不同的未来和世界,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之间有可能相互削弱或产生冲突。该项目要求其合作伙伴组织思考各自组织内部通过其特定的保护实践所构建的不同未来图景,并探索这些图景与其他图景之间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该项目旨在鼓励合作伙伴针对共同问题制定共享的、综合性的应对方案,其中许多问题都涉及全球关注的议题。

王:如今,我们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新技术、新理念层出不穷。您如何看待数字技术和公众参与在博物馆未来发展中的作用?

哈里森: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机会,让我们能够围绕特定形式的遗产展开对话,扩大公众参与,并促进关于哪些遗产具有价值,以及应该如何保护的更广泛讨论,这成为我们开发一款名为“凝空幽灵”^②(Ghosts of Solid Air)的场域特定增强现实(AR)手机体验的起点。该项目于2023年作为英国电影协会(BFI)伦敦电影节延展项目的一部分正式推出。近期世界各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需要在历史建筑环境中讲述更加细致入微、多元化的故事。这不仅关乎公共空间中呈现哪些历史以及如何呈现,还关乎谁能够参与讲述这些故事,以及他们拥有怎样的能动性来塑造新的叙事。“凝空幽灵”旨在展示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和虚拟现实体验以及推测性非虚构叙事如何丰富和深化当前围绕遗产地的讨论,并提供丰富的体验,从而吸引新老受众对历史环境及其对当代社会所蕴含的价值进行批判性思考。我认为这些是数字时代博物馆和遗产领域面临的关键问题。

①“景观再野化”(landscape rewilding),是指在减少持续人为干预的前提下,通过恢复关键生态过程,使高度人类化景观重新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类生态实践。

②可以理解为“被凝固的空气”“固化的空气体积”“空气的物质性”,ghosts与AR(增强现实)结合,暗指隐形、被历史或记忆掩盖的身影、影像、事件。Harrison, Rodney, Rose, A., & Sterling, C., *Ghosts of solid air: contested heritage and augmented reality in public sp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31(4), 2025, pp.425-443.

四、中国遗产研究的前景

王：我注意到您从去年开始也进入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并在广西开展了实地调研。您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有何看法？您认为未来10年文化遗产研究最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哈里森：过去一年，我们一直在开展博物馆能力建设工作坊和实践项目，旨在探索我们为“重塑博物馆以应对气候行动”（Reimagining Museums for Climate Action）项目而开发的“为气候而站：博物馆动起来”（Mobilising Museums for Climate Action）工具包如何在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合作的框架下，能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开展博物馆气候行动能力建设项目的基。我们在广西的项目是与广西民族大学的王林洁博士，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合作开展的。参加我们在中国的博物馆气候行动能力建设研讨会的20名学员来自该地区不同的博物馆和遗产机构，以及关注种子保存和分享实践与区域气候相关倡议的非政府组织。这种汇集不同专业人士和视角的做法，与我过去在多个项目中一直秉持的方法相一致：鼓励参与者分享来自不同背景的观点，并探讨如何从一个案例中学习到的新视角和方法应用于另一个案例，从而产生创新。继2024年11月在南宁举办的首次线下研讨会（会上介绍了“重塑博物馆以应对气候行动”和ICCROM的“我们的藏品至关重要”项目）之后，2025年1月和2月又举办了五场网络研讨会。研讨会内容包括：

1. 介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中规定的气候行动，以及当前的《格拉斯哥气候赋权行动工作方案（2021—2031）》；

2. 介绍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指标及其与博物馆和藏品工作的关系；

3. 了解当地气候影响、适应措施和参与者面临的挑战；

4. 支持人们寻找和利用现有的工具来支持气候适应，例如 ICCROM 的“我们的藏品很重要”和“为气候而站：博物馆动起来”工具包；

5. 如何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重点来确定具体的活动措施 / 指标（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13.3“提高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预警方面的教育、意识提升以及人力和机构能力”），并借鉴 ICCROM 的“我们的藏品很重要”计划开发的基于藏品的指标。

我们的研讨会还探讨了中国的气候减缓和适应计划，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牵头制定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十四五”规划、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2023—2030）》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的气候适应计划，以及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提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研讨会的核心内容是制定一系列个人或集体倡议或项目，这些倡议或项目旨在应对气候赋权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问题，参与者在网络研讨会结束后的12个月内开展和实践这些项目工作。我们目前也正在支持这些项目的开发和实施。我们的“为气候而站：博物馆动起来”^①已被翻译成简体中文，现在可以在线免费下载。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绿色能源转型领域的领先国家之一（事实上，2025年，全球四分之三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都来自中国）。鉴于中国在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大力投资于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将“气候赋权行动”（ACE）与中国文化领域联系起来的机会尤为重要。

①[英]麦吉·亨利《为气候而站：博物馆动起来》，王林洁译，伦敦大学学院，2025。<https://www.museumsforclimateaction.org/mobilise/resources>。

王:您认为中国和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在塑造国际遗产话语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您如何看待遗产研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之间的关系?

哈里森:我认为中国,尤其是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与全球北方国家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对话机会。我的许多新项目都聚焦于这些南北知识交流的机会。我在中国的工作中发现,广西柳州市工业博物馆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该博物馆不仅诠释和传播了柳州市的工业历史,还专门辟出三个展馆中的一个,展示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柳州市为适应、应对和改善这些环境影响所做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柳州市经历了中国最严重的酸雨和其他污染,此后,文化部门(博物馆和遗产机构)通过清晰坦诚地解释转型的必要性,支持了柳州市向清洁制造中心的转型。我在欧洲的工业遗产博物馆中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展现了从全球比较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分享和借鉴世界各地的经验。社会各界和世界各国都需要共同努力应对当前的全球危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如何相互分享知识和方法,以帮助建设更可持续、更公平的未来。

王:非常感谢哈里森教授,我认为此次访谈很重要,我更加确信,当代遗产研究已经从“保存过去”迈向“面向未来的知识体系重建”。您以其跨越考古学、人类学、博物馆学、文化研究与环境人文的复合研究路径,向我们展示了遗产如何从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转而成为理解人类世、重塑地球未来的一种新方法论。在这个理论系统中,遗产不再是静态的文化资产,而是人与非人类、自然与文化、地方与地球尺度共同交织的未来制造机制。

这次对话不仅让我们得以回望批判性遗产研究半个世纪的理论演进,更重要的是,它还将气候行动、能源转型、数字技术、环境正义、南北知识合作等议题纳入了遗产研究的核心议程,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学术前沿,尤其在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哈里森教授倡导的整体性、人类世遗产、后人类视角的遗产观,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与战略价值。

我相信,此次访谈不仅是一次学术访谈,而且更是未来合作的新起点。遗产研究正在成为连接世界、回应挑战、共同塑造未来的重要智识平台,我们也将在这一进程中贡献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购 阅 启 事

欢迎广大读者通过邮局订阅《民族艺术》(邮发代号48-58,2024年每册定价20.00元),若在当地订阅有困难或需破季订阅、单册购买,可汇款到民族艺术杂志社发行部邮购。

本刊尚有少量往年过刊,欢迎购阅。

地址:广西南宁市思贤路38号《民族艺术》编辑部

邮政编码:530023 电话:0771-5621053